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牛津通识读本

中国文学
Chinese Literature

[美国] 桑熹华 / 著
李永毅 / 译

[美国] 桑真华 著 李永毅 译

中国文学

牛津通识读本 ·

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 / (美)桑稟华 (Knight, S.) 著, 李永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 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6134-5

I. ①中… II. ①桑…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1723号

Copyright © 2012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Chinese Literatur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2.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85号

书 名	中国文学
作 者	[美国] 桑稟华
译 者	李永毅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毫米×889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 页	4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134-5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前言

登鹳雀楼

【王之涣(688—742)】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首公元 8 世纪的绝句让我们想起中国人将文化视为绵延之河的传统观念。这条脉动的大河虽经历了许多曲折，吸纳了许多支流，三千多年来却一直哺育着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①中国的思想家自古以来就在探寻这条深阔之河的“道”与“理”，他们的领悟反过来也塑造了它的流向。举例来说，他们信奉治乱循环、否极泰来，或许这正是绝句起承转合的观念渊源。在王之涣的诗里，这种整饬的结构向我们呈现了广袤的视野，虽然日落带来一丝感伤，末句却仍蕴含着上进的力量。蜿蜒的河

^① 西方人一般把有文字记录的商朝视为中国历史的起点，这样算来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多年。——除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道最宜登高远眺，以观其轮廓，体其深意。

本书讲述的是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历史，主要关注文学文化在回应社会与政治关切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本书将文学文化理解为人类在经验洪流上引航的集体努力，将中国文学看作一条浩瀚的河流，其间奔涌着人的激情，特别是道德与感官的动荡，以及陶冶与规范这些激情的审美实践。中国的几大思想传统都坚信，人心困苦不宁乃缺乏大视野所致，文学则能开启人的眼睛、智力与心灵。

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中，文学文化在实施善政、改进社会的事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展示审美与伦理教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书重点介绍抒情诗和叙事体裁，同时也涉及哲学、历史和戏剧。鉴于狭义的文学概念直到 19 世纪晚期才诞生，选择这样的范围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尊重：文史哲本是一家。

在中国的语境中，文学研究鼓励人融入文史哲这个整体。文学讨论自然的盛衰循环，以理解变化的动态过程。受这种倾向影响，文学理论将历史与自然进程的变迁看成辽阔的风景，将单个作者、运动以及体裁的兴衰置于其中来考察。当唐代的律诗绝句不再流行，它便让位于词和曲；整个诗歌体裁衰落了，叙事文体便崛起了。这些理论常认为文化发展有其内在的生命，但中国文学的历史也是它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历史。精英阶层的奖掖至关重要，作品传播与经典化的习惯也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阅读单篇作品的快乐，就像凝视河面的倒影。而要看到河的深处，则不仅要应对语言问题和跨文化理解的问题，还要探究权力的运作——包括阶级、性别、民族和国家观念。

本书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在不同文本的对话中呈现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比较的方法不仅能凸显主

流方向，也能对汇流与潜流保持敏感。它也突出了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多元性和兼容性。人性意味着什么？仁者如何传道、言志、叙事，如何相娱相教，如何建设一个有教养的社会？中国文学所提供的视角与今天的伦理、美学、社会和环境问题息息相关，本书旨在帮助读者参与这些对话，并将其发扬光大。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相信弟子能够举一反三，这本简略的小书也效法圣人，试图为游历中国文学的无边景致提供一份指南。书的内容虽然有限，仍愿这些匆匆掠影能激发读者继续探究这一强盛传统的兴趣，正如王之涣鼓励他的读者更上一层楼。

前言

目 录

- 前言 1
- 1 基础:伦理、寓言和鱼 1
- 2 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 24
- 3 文言叙事:史书、笔记和志怪小说 49
- 4 白话戏剧和小说:园林、草寇和梦 69
- 5 现代文学:创伤、运动和车站 83
- 索引 113

基础：伦理、寓言和鱼

中国文学中的求知之路有时会令人惊讶。以传说中的智者庄子(约前369—前286)命名的文集会让偏爱直觉领悟的读者眼前一亮。庄子和名家的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曾有下面一段对话：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先是用惠子本人的逻辑来反驳，然后却提供了通向智慧的另一条路径。正如惠子即使不肯承认，其实也知道庄子所知，庄子同样能感觉到鱼的快乐。对名家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唯一工具。而在庄子看来，既然他和鱼同属一个宇宙，他就可以和鱼感同身受。物我之间的此种感应意味着不断扩展人的视野，这正是《庄子》的一则寓言中河伯所收获的道理。河伯游至北海，方知此前所见只是一隅。北海若评论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中国思想各大流派都渴望更加辽阔的视野，最受爱戴的诗人、乐天的政治家苏轼（1037—1101）最精彩地表达了这种向往。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记述了泛舟长江的一次夜游。当饮酒的宾客途经一处著名的战争遗址时，气氛变得忧郁起来。此地的兵败事实上决定了汉朝覆亡的命运^①，所以众人不免谈起了无常与恒常的话题。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上那些王国的终结？一位宾客不禁哀叹人生的无足轻重：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为了解开朋友的心结，苏轼以盈亏不止的月亮和奔流不息的江河为例，说明自然也有恒常的一面，应该更达观地看待变化：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苏轼在11世纪关于无常与恒常的沉思触及了中国文学想象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人生如此短暂，我们该如何应对？时间流逝的忧虑让得失荣辱的问题，出仕为官的责任以及对友谊、家庭和种种成就的追求都变得格外紧迫。文学文化起到了帮助人们探讨这些问题和欲望的作用，这种对人生抱负的关注也能指导他们如何面对时光中的变迁。按照公元前4世纪晚期《左传》

① 这里作者对史实的记忆或理解明显有误。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战败，但最终废掉汉献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军战败促成汉朝灭亡，逻辑上无法成立。

的说法，“言”是实现“不朽”的三条途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之一。

传道：“文”的力量^①

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文献之古老令人震惊。虽然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的差异堪比英语和拉丁语的差异，今日的专家仍能解读商代（前 1600—前 1046）遗留下来的刻在龟甲羊骨上的汉字。这些用于问卜的甲骨文由单个的字组成，神的回答则要根据炙烤之后骨头上形成的裂纹来揣测。

这些文字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虽然字形字义经过了漫长的演变，今日的中国人仍在使用古书里的字，中国的核心传统能凝聚至今，书写体系的延续性是关键。整片大陆上书写体系的统一克服了不同地区不同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确保了沟通的顺畅。许多方言在口头上的差异不亚于德语和英语的差异。^②

中国能历经三千余年依然屹立，或许更应归功于文学传统，而不是政治史。和罗马帝国不同，中国在历次分裂之后总能重新统一，部分便是依靠国民对“文”之力量的信仰，这个矛盾重重却韧性十足的文明得以维系，汉字居功至伟。作为与“武”相对的和平领域，“文”被视为治国的根本和促成文化和谐必不可少的手段。公元 3 世纪的陆机在《文赋》结尾称赞文学是连接不同时代的桥梁：“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

① 英文原文的“pattern”指向“文”的词源义“纹”。

② 原书在这里讨论了英语的两个词语 *dialect*（属于特定地域或群体的语言变体）和 *topolect*（属于特定地域的语言变体），认为用后者来称谓中国的方言更合适，但这个讨论对中国读者没有多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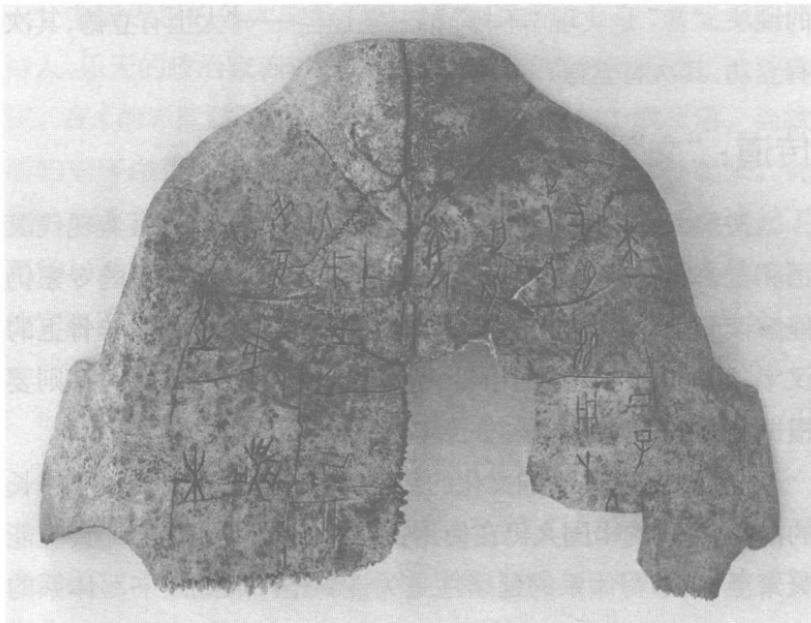


图1 这片龟甲(约前1300—前1050)上可以看见早期的汉字(甲骨文)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不仅是某个现实世界或理式世界的镜像^①,而是世界借以生成的有形手段。“文”的模式被视为自然结构之“理”的具体呈现,文学在传递自然和伦理之“道”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精心创作的文学就可让人深信,宇宙秩序森然,并且内具道德法则。这种信念的力量后来体现为家喻户晓的“文以载道”四个字,所以典籍和评注典籍的学者才在中国文化里居于中心地位。圣人孔子鼓励弟子在履行道德责任之余努力学文,

^① 这里原书明显指西方盛行的摹仿论和柏拉图的理式论,原文“ideal forms”并非“理想化的形式”,而是特指柏拉图的理式(form)。

这种学习被视为出仕者所应接受的基本教育。

虽然“文学”后来成了与英文 literature 对应的中文词语，“文”的词源义却是“纹”，例如织物的花纹。与西方“博雅学科”(liberal arts)的概念相似，“文”可以指任何有确定模式的艺术体裁，“文字”^①可以很好地涵盖早期中国的广义文学概念。古希腊罗马世界认为博雅学科是自由人应当接受的教育，儒家也相信，要培养仁德，文学最为重要。领悟宇宙内在的秩序无须牧师或其他中间人，但老师和文献必不可少。

文人

或许只有在中国，人们才如此自觉地把文学当作一种集体事业。阅读和创作让个人融入了人类的永恒长河中，士大夫阶层也把他们的特权理解为一种沉重的责任。因为相信自然与伦理之道都潜藏在反复出现的模式中，所以他们强调识别模式的能力，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在周朝(前 1027—前 256)的衰落期，反观历史变得日益迫切。铁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形态，战国时期(前 475—前 221)军事强盛的封建诸侯国纷纷吞并邻国，最后西方的秦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前 221—前 207)^②。(英语表示中国的词 China 就是源于“秦”的音译。)

秦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让有才华的文人担任官职的行政体系。在这个新兴士大夫阶层获取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秦国在书写文化和政治之间锻造了一种延续至 20 世纪晚

^① “文字”对应英文原文的“carefully patterned writing”，这里的 patterned 仍指向“文”的“纹”之意。

^② 英文原文是“北方的秦国”，有误，译文作了更正。

期的联系。在公元 605—1905 年之间的 13 个世纪中,政府大多数时候都实行以研习古典文献为基础的科举考试,从而强化了这种联系。

由于古文颇为艰深,只有士大夫这个精英阶层掌握了读写的能力。学习读写需要专人教授,还需要时间和获得图书的途径,只有少部分人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在宋朝(960—1279)的印刷术大幅提高识字率之前,大多数作家都属于统治的官僚集团。这些文人阅读的经典库相对固定,共同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的凝聚力和政治势力超过了其他国家的类似群体。文人需要统治者的扶植,统治者也需要文人评注古代典籍,为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经典

尽管秦始皇(前 221—前 210 年在位)的焚书行动毁掉了法律和技术书籍之外的其他文献,由于有一些史书逃过劫难,保存于其中的许多先秦文献仍得以流传下来。将精选出来的文献尊称为“经”提高了这些早期著作的声望。它们通过后世累积的传、疏、注不断演化,这些阐释多半是为特定的统治者或政治方向寻找理据。

自汉朝(前 206—220)以来,“五经”专指《易经》(占卜书)、《诗经》(最古老的诗选)、《书经》(上古文告谕令汇编)、《春秋》(编年史)和《礼记》(三部礼书的合集)^①。由于公元前 2 世纪发明了纸,这些经典被刻在石碑上,然后用纸拓印,几乎所有中国文人都将它们熟记于心。

到了 4 世纪,经典著作的范围扩大了,文献被分为了四类。

① 即《周礼》《仪礼》和《小戴礼记》。

这种分类法把“经”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史”，然后就是“子”（思想家或者后世所称的哲学家）和“集”（文学选集）。“子”部著作通常由后人汇编而成，内容多是某位学派代表人物与门徒或辩难者的对话，书里往往有许多隽语妙言、精彩对话、寓言和掌故。这个类别也包括了专门的医学、军事和宗教著作，包括道教和佛教典籍。后世称为小说的作品一般没有资格进入这四部，因为经史子集的要义都在于传道。

围绕道的论争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由于当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职业的思想家和纵横家得以崛起。这些胸怀天下的文人竭力游说诸侯，改弦更张，以实现和平与良治，那些无法出仕的学者则设馆授徒。因为他们，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交锋分外活跃，以“百家争鸣”而闻名。所谓的百家之中，由于史学家司马谈（卒于前 110 年）的确认，有六家对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除已经广为人知的阴阳家、儒家和墨家外，司马谈将另外三家称为法家、名家和道家。

不久之后，佛教也深度参与到人生正道的论争中。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成了中国思想的重要一脉，西土传来的佛教故事也成了中国最早的叙事作品。到了公元 2 世纪，释迦牟尼的韵文传记和种种佛教寓言已被译成汉语，这些故事和经文都成了文学传统的重要元素。（“经”的尊崇名号也用来指佛教典籍。）佛教的空、缘、业、轮回等观念经常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并且很快扎根，成为底层的信仰。在公元 220 年汉朝灭亡后的分裂局面下，这些信仰更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到了唐朝（617—907），重新统一的中国武功强盛，以包容之心广纳异国人士、异国思想，佛教的主题与文学体裁已经对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变革做出了贡献。20 世纪初，在中国西部的敦煌石窟中发掘出近四万件 11 世纪以来就被

尘封的手稿,让我们对这种影响有了全新的认识。

各大派别的思想虽各有侧重,但也有许多共同的信仰,例如都相信一种基于天、地、人相互融合的终极和谐之道。每派都认为其他各派的教义并非错误,而是只得到整体之一隅。经过几个世纪的相互辩诘、相互滋育,它们不断彼此渗透,那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便成了文学传统的主流。中国文学的基础可以描述成一些互相交叠的求道之法。

易之道

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一套丰富的词汇来探讨变化的精微过程。印欧语言通常突出名词、本质与物质,古汉语却更看重动词、过程和情境。中国文学把历史的转型看成缓慢变化进程的最终结果,所以经常拒绝给出精确的定义和静态的范畴。

对变化的强调可以追溯到《易经》,它在公元前 10 世纪成书



图 2 敦煌附近出土的文物中有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书籍,公元 868 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

时只是一本占卜指南。“算命术”的古老之根竟逐渐长成了世界文学中一棵主要的智慧树(它以“易经”的音译为英美人所知,这在中文书里极为罕见)。

这部经典的核心部分是六十四则短的预言,每则预言分别对应由六爻组成的一个卦象。^①阳爻是实线,象征运动,阴爻是虚线,象征顺从和静止,合起来的卦象代表宇宙循环演替的各个阶段。用这些图案来阐释,宇宙就显示出某种终极的秩序。这六十四个卦象是生命关键节点的隐喻,借助它们提供的这个符号宇宙,个人可以分析自己的困境,皇帝可以测算治国术的吉凶。

《易经》的开始两卦——代表天的乾卦和代表地的坤卦——分别对应于原初的阳和原初的阴,而阴阳的词源义分别指山背阴和向阳的一面。正如光与影在山脊上交汇,激发的阳和回应的阴也在自然的因缘际会中彼此作用。这些偶然因素虽非人力所能左右,但在中国人看来,却遵循着有规律的模式。如果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运行机制,人就会对自然倾向背后的“势”生出敬畏之心,也会深信人具备因势利导的能力。下面以第二卦为例,说明《易经》如何判断卦象:



图3 “涣”是六十四卦之五十九卦,上“风”下“水”,可以理解为僵硬状态的解除或者懊悔情绪的化解

① 这里的每则预言(prophecy)即每卦对应的卦辞和爻辞,英文用hexagram表示六十四卦的一卦,意为“六笔的图形”;用trigram表示八卦的一卦,意为“三笔的图形”。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因为卦象代表的是不断演化的“势”和长跨度的影响，卦辞和爻辞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下的冲动和压力，这样《易经》就为书面文化如何指引伦理确立了范式。

《易经》的解经部分通常称为“十翼”。虽然相传是孔子所作，它们却用了孔子身后的阴阳家理论，创作时间应接近公元前3世纪。根据这样的理论，阴阳无休止的相交产生“气”，“气”是宇宙的生命力，体现在呼吸、空气、能量和物质中。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循环，五行又分别与五脏、五色、五臭和中国传统音乐的五音相联系。按照感应的原则，每个领域的变化都会对其他领域的同一种“行”产生影响^①。这种交互感应的宇宙学叫“阴阳五行”，它促使人们尊重变化不息的生态系统，也鼓励人们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正如阴阳的平衡随四季而变，政府的政策也可因时制宜。

基于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中国人对治乱的循环更替，对刚与柔、动与静、言与默、显与隐的相互作用都有敏锐的体察。正如乐与哀相互渗透，直接与迂回也分别适合不同的形势。《孙子兵法》(约前4世纪)关于军事对抗的讨论，太极拳和气功的练习，中医的寒热理论，中国诗歌含蓄蕴藉的风格，都反复体现了这条原则。

① 这里的原文 agents 特指五行，五行在英文中的最常见译法是 five agents，也有译为 five phases 的（原文上一句的五行便是如此表达的）。